

浩氣長存—— 華理柱主教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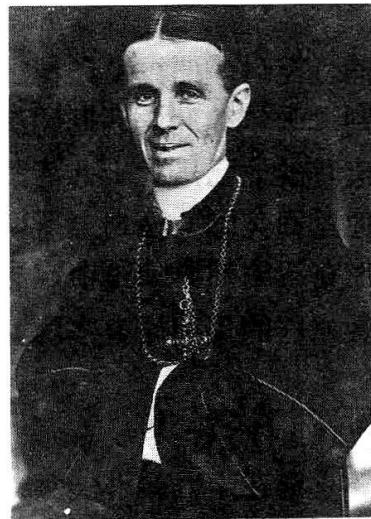
Jean-Paul Wiest 著
林瑞琪譯

在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一位身體虛弱的西方老人，踽踽獨行跨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進入英屬的香港。他是最後一位離開中國的外籍傳教士。未出境前，他曾被囚在上海的監獄中達十二年之久。

數日後，歐美各國的報章紛紛以頭版刊登他的照片及名字——美國瑪利諾會的華理柱主教。一夜之間，他從完全遭人遺忘一變而為英雄及傳奇人物。

他的一生

華理柱主教的畢生事蹟，足以寫成一部暢銷的傳記。從少年時代起，他已是勇於創先河的人物。二十一歲的時候，青年的華理柱成為了瑪利諾會首批六名學生之一，標誌著美國天主教會在海外傳教事業上新的一股力量。六年後，他與另外三位瑪利諾會會士同赴該會的首次傳教旅程。他僅在華南工作了一年多，就獲委為這個先驅團體的領導人。不久，他受任負責一個傳教區，幅員較諸他的故鄉馬利蘭州大上一半。一九二七年，他年僅三十六歲，即已成為瑪利諾會首位主



教。

華理柱主教在華南的早期生活，處處擔驚受險。他曾遭土匪禁錮；又受困於軍閥內戰；濕熱的氣候，加上洪水、颱風、到處滋生的霉菌，以至於白蟻及其他無數的昆蟲，都令華理柱主教吃盡苦頭。

一九三六年，華理柱主教來華十八年以後，他受托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由會友選為瑪利諾會首任總會長，以繼承剛去世的會祖 Bishop James A. Walsh。十年任期剛剛屆滿，華理柱主教立即返回中國，完全投入工作。他擔任了公教進行會的秘書長。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主要目的是統籌及協調各傳教會在全中國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華理柱主教被中共政府拘

捕，控以「間諜及顛覆」罪。兩年後，他被判二十年徒刑。刑期屆滿之前他已獲釋，但這時候他已是七十九高齡的老人了。其後，他返回美國，極力迴避傳播媒介的注意力。他在紐約州奧仙靈市定居，在他展開人生傳教旅程的瑪利諾會修院安渡最後的十一年。

明確的目標

早在十九歲那一年，華理柱已開始認真考慮投身司鐸的行列。不過，他並沒有投考本地的修院，因為堂區工作並不適合他。兩年後，在偶然間他閱讀到一份瑪利諾會雜誌（該刊後來稱為「遠方」），他忽然間感到被召喚：「當我第一眼看到它的名稱——美國天主教海外傳教會時，我感覺到這正是我所期待的機會。」¹

一九一二年四月，青年的華理柱向瑪利諾會會長 James A. Walsh 神父表白傳教聖召的意願：

一個月前我作出了這個決定。這較在國內工作更加適合我…… 我對這聖召沒有半點懷疑，並深深希望能貫徹它。²

自此以後，他一往情深地投入他所形容為「在人們心中拓展天主神國的工作」。³ 為了達成這項宏願，他認為傳教士應該是全面發展的人，在體格上、精神上及靈修方面都要達致完美：

我們蒙召到異教徒當中去服役。在體格上應健全堅強，以應付艱鉅的工作。在精神上，應有不恥下問的態度，願意向他人學習；有慷慨無私的態度，不求報酬；有包容接納的態度，尊重他人的觀

點。在靈修上，應具備每一方面的德行。但無論何時，都以成為上主的傳訊者為首要任務。⁴

蒙召成聖

在芸芸聖人之中，聖保祿、聖方濟各沙勿略及聖 VENARD 三人最受華理柱主教所推崇，因為在他的心目中，他們三人都同樣全力以赴同一的目標，拓展天主的神國。

即使我們不能夠修練到這些聖人的德行，也起碼應學習他們的原則；即使我們跟不上這些偉人的步伐，也應追隨他們的路向逐步向前。儘管能力有限，但精神卻是不變。⁵

華理柱主教很明確地意識到，要實現他的傳教理想，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德成聖。一九三六年在他所寫的文章「傳教士素描」中，他向所有瑪利諾會會士分享他最內心的感受說：一個瑪利諾會傳教士不單要成為一個普通的傳教士，更應成為一個好的傳教士，亦即是說要成為聖人。

當普通的傳教士突然意識到，自己如何缺乏面對工作所需要的智慧及性格時，他必須打開一道適當的新途徑。這是他的唯一希望。上主塑造他成為這般軟弱頑固的受造物，然後派遣他像個稚子般去做成人所擔當的工作，就是要派遣他去成聖。與其模仿聖人，倒不如簡單地自己也成為聖人。這是最容易成功也是唯一的方法。這也可以說明，何以雖然世上有那麼多的傳教士，但好的傳教士則像聖人一般罕有。⁶

爲窮人服務

一九一八年聖誕前後，華理柱主教所抵達的華南窮鄉僻壤簡直滿目瘡痍。疾病蔓延、內戰不斷、土匪橫行，以至從無間斷的洪水及颶風，都嚴重地損害了當地的經濟。各地都貧乏不堪，饑荒開始蠶食各鄉鎮。由於缺乏保健及醫療服務，兒童多患迴蟲，成人則常受瘴氣所苦。霍亂及鼠疫像爆竹一樣連珠爆發。除此之外，更有無數麻瘋病人在鄉鎮外圍的墳地上挖開土窟棲身。

華理柱來華的任務本來是傳揚福音，召集群眾加入天主教會，但這個時候他似乎立即明白到他有責任協助這些中國農民渡過難關。數年後，他在反省自己的聖召時，以詩人的筆觸記述他與赤足的農孩碰面時，如何產生出對窮人的親切感：

直至到愛火騰昇之前的一刻，我從未經驗過及掌握到甚麼是愛。面對著羞澀的村童，出現一幅赤貧如洗的景象，我的心中不期然地詠起「我選了你」。「我選了你，與千百萬與你一樣的上主子女在一起；與勞苦過度的、無人照料的、遭遺棄及蔑視的、陷於困境及舉目無助的人在一起。我選了你，願意獻出一生為你，我不求名利，但願獻出每一分力量為你。這個突然奇來的啟迪，燃亮了我畢生的理想。」我以身為傳教士而自豪，肩負使命向貧窮人傳播福音。⁷

自此，華理柱完全獻身於為窮人服務，開辦孤兒院、育嬰所、學校以至一所醫院，並開設一處麻瘋村。他的仁愛工作與梵二之前天主教的傳教主流策略十分吻合。仁愛工

作可以說是吸引外教人注意的敲門磚，把他們帶到教會來。在 *Mission Manual* 內他談及江門教區的教務時，詳述了這方面的技巧：

曾經引領外教人入教的傳教士都知道，最好的方法是認識清楚他們在生活上的困難，然後協助他們解決。在起初他必須弄清楚，真正的力量泉源不是他個人，而是派遣他的整個聖教會。⁸

不過，假如我們把華理柱主教的仁愛工作說成只是一種招引歸依者的方法，則會誤導讀者。他的仁愛服務是建基於他的信念上，認為服務及慈愛是基督宗教的特質，這份特質對非教徒來說，有無比的吸引力，誘導他們探究箇中原因。與其他同期的傳教士一樣，他為拯救千百萬中國人的靈魂而來。但他的目標，卻必須進入那充滿戰爭與和平、豐收與飢荒、生命與死亡的人類歷史及人生境況中。這樣的目標，使他明白到中國人不單是待救的靈魂，也有權在現世過更美好的生活。這使我們理解到，何以當他談及熱愛窮人的故事時，採用了「靈魂就是人」這個題目。⁹

個人的適應

傳教士對中國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會深切影響到中國人對教會的觀感。在中國的瑪利諾會傳教士面對了身體上、靈魂上以及工作上不同的挑戰。實質環境並不利於他們的身體，當地的氣候不宜於北美洲人。當地多山，交通工具既短缺又不可靠。社會動盪防礙了製訂長期傳教計劃的工作。中文的艱澀及方言的眾多，令到很多傳教士難以與當

地人溝通。中國的豐厚文化遺產及複雜的哲學宗教觀念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鉅細無遺。中國的文化、哲學及宗教信仰書籍，無疑能增加傳教士對中國的認識及敬意，但書本上的知識卻不能令傳教士「成為」中國人。

一九三六年，華理柱主教為瑪利諾會傳教士撰文分析在中國生活所遇到的困難。他的研究報告「傳教士的個人計劃」，不單只是理論上的探討，更是十八年在中國不斷深入生活的體驗。他的個人經驗超越了時空限制，至今仍對傳教士產生啟發作用：

活像一尾魚跳離水面一樣，傳教士必須重建一個他能正常地工作的環境……

這是適應的問題，而適應意味著某些事物必須改變……中國本身不會變，最起碼不會立時變得令傳教士感到一切都習慣。所以，惟有我們這些傳教士，得自行大幅地改變自己，好能配合這個新的國度的各種事物，而不是要這個國家的四億人民來配合我們。10

「心意良善，手法靈巧」是漫長的改變過程中必備的條件，而「耐性」更是最重要的一項。有助於成功地適應的方法尚包括：熟習語言、認識中國文化以及他們背後的哲學理念。華理柱主教指出有很多根深蒂固及出於自大的謬誤，可能導致傳教士放棄改變。首先，打亂他一向習慣的活動方式而注入新生活，就是一個難題：

傳教士是一個來到陌生國度的陌生人，忽然間失卻一切觀看、理解、判斷、行

動的能力。直到他能完全適應周圍環境，生活上任何瑣事都能得心應手，所得到的樂趣及得益才可以彌補原先生活上受束縛的損失。11

另一項危險是對不熟悉的民族及文化產生優越感：

經驗告訴我們，一般人對不熟悉的風俗，即使未至於輕蔑，起碼也不會重視。對不熟悉的民族亦同樣，我們知得愈少，愈不懷敬意，因為他根本未有能力去了解其周圍事物所具有的意義，只是處身於與他毫不相干的異域異民之中。12

第三項危險是華理柱主教認為最嚴重的，就是對中國一知半解。

有些傳教士學曉了一點點方言，用粗略含糊的方法去了解周圍的事物，研究一點點較顯著的風俗，關注一點點較明顯的特危。他們看一點點、聽一點點、讀一點點，也反省一點點，但僅是一點點而已。他往往錯過了身邊大半的事物，而對另一半又常常誤解……在中國，他始終是個外國人。13

在另一篇致瑪利諾會修士的文章中，華理柱主教說仁愛、犧牲、智慧及神貧的精神，合起來就是達致成功適應的靈修因素：

缺乏愛心的人很少願意改變。不願犧牲的人無法改變自己。假聰明的人則看不到有改變的需要。不重視神貧之德的人會失去促成改變的最大原動力。14

中國人的教會

為華理柱主教而言，適應並非是個人的事。假如要使天主教在中國繁衍，必須先培育出中國化的根，並交在中國人的手中。早在一九二三年，華理柱主教已倡導瑪利諾會修女開展國籍修女的培育工作：「我們目前急需大量傳道員，按我的經驗看，土生土長，能說廣東話的修女在這事情上更能發揮實際的作用。」¹⁵ 八年以後，時機成熟了，他們在江門傳教區成立了專門收納中國籍修女的初學院。

同樣在一九二三年，華理柱主教及他的會友也開始招募有意修道成為司鐸的男士。四年後，傳教區的小修院落成了。華理柱主教在《遠方》雜誌上寫道：

假如教會在本地人心目中仍是外國人機構的話，傳教士的工作仍不算成功。本地神職人員，是教會在中國享有與在歐美同樣獲得人們接納的最佳明證。¹⁶

為了使中國普羅大眾能明瞭天主教要理，華理柱主教致力解決宣道讀物短缺的問題。舉例說，流通全國的中文要理，是以北京方言寫成。受過一定程度教育者都可以看得懂，但對千百萬讀書不多又不懂國語的貧苦大眾而言，要理課本的句子及讀音似乎有點難以上口，甚或不明所指。在江門傳教區，華理柱主教已意識到廣東人在語法結構上與北方國語不同的問題。因此，他專注於修訂一本以操粵語者為主要對象的簡易要理。一九三七年，他出版了粵語要理，專門切合中下層人士的語言能力。

為使天主教會能立根於中國，不但傳教士及他們宣訊內容要盡量中國化，宗教場所的外貌也要中國化。一九二三年，華理柱主教訂立下一系列發展藍圖時，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主教即鼓勵他藉著這些機會發揚本地公教藝術及建築。華理柱主教對宗座代表的「命令」毫無異議，因為他本人正有此意。他希望建築一些小堂，讓本地人可以很自在地祈禱。他不願意作為天主教會有形可見的象徵的聖堂，會被非教徒視作一種向當地人的挑釁。因此，他計劃盡量把聖堂建築得充滿中國色彩。¹⁷

甚至連在江門市的主教座堂，華理柱主教亦採用了中國式建築物的外表向平面發展，以配合周圍環境。這是從中國廟宇式建築物演化為聖堂的作品中最傑出的一項。聖堂入口設在側面，人們趨近時，會先見在屋頂斜坡，而不是高聳的正面。聖堂的裝飾也除去浮誇，以免被中國人視為「舶來品」。華理柱主教把這敬禮天主的場所，盡量使一般中國老百姓樂於接受。

面對拜祖先這一微妙的問題，華理柱主教對中國人的作風抱著體諒的態度。儘管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天主教會仍視敬孔祭祖為迷信行為，但華理柱主教開明地按他在傳教區內的權限，確定絕大部份祭祖行為不涉及迷信活動。舉例說，曾經有一位男士多次拒絕領洗，因為他需要按父母生前的指示，定期攜「迷信」的供品到父母的墳前，華理柱主教為他打開困境說：「這位人士並不是迷信，而是孝順而已。」他隨即示意神父為這人施洗。¹⁸ 華理柱主教這樣做，不單是因為他明白中國文化，更因為他感覺到教會在

這方面出了錯誤，必須採取措施加以更正。再一次證明他是站在受苦者的一邊。

獻出自己

在他擔任瑪利諾會會長的十年任期中，華理柱主教致力於培育合適的海外傳教士，他把經驗寫成論文，暢論如何預備傳教區宗徒事業及發展合乎傳教區需要的靈修學的問題。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瑪利諾會靈修手冊」，實是他昔日所寫的「傳教士素描」的延伸。他提出了二十點成為優秀傳教士的條件及特質，包括易於相處、適應力強、和藹可親、愛心、自信、勇氣、堅毅、幽默、創意、坦率、忠誠、氣宇軒昂、客觀、忍耐、不屈不撓、深謀遠慮、有負責心、謹慎、肯犧牲及熱心工作。他在導言中寫道：

瑪利諾會學生得要裝備自己成為傳教士。在準備工作中，沒有一事比德行上的良好基礎，對成功的傳教事業更有幫助。修院不單是一處祈禱及學習的場所；它更是一處強化靈魂、陶成思想的地方，好能培育出傳教士所需的性格。19

在這個時期，很多瑪利諾會會士都死於亂世。第一位致命者是 Donovan神父，一九三八年遇害於東北的土匪手中。華理柱主教強調隨時預備迎接這最大的犧牲，這是瑪利諾會的傳統之一：

「跑畢全程」及「獻盡所有給上主」，是瑪利諾會會祖兩句刻骨銘心的格言。他們知道從基督的宗徒時代起，一直以來都要求這愛德犧牲。因此他們定這為

教學的一部份……簡言之，他們知道瑪利諾會必有致命者，但又因為他們或其他人都不知道誰能有機會為主致命，因此他們認為所有具備聖召者均應在此事上作同樣的準備。20

一九四八年華理柱主教返回中國，擔任公教進行會的執行秘書。當時他已做好準備，隨時為滿全聖召使命而獻上自己的生命。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海軍管當局取締了公教進行會的活動，並陸續拘捕會內的工作人員。華理柱主教幸未遭到拘禁，卻自願留在市內。其後的七年時間，他致力於撰寫著名傳教士的成功之道。他也盡力協助那些想離開中國前往香港的外籍或中國籍人士。他善用與英國大使館的聯繫，以提供必須的出境證件及護照。至於那些無法離境的中國朋友，華理柱主教盡量為他們提供金錢及糧票，好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為家中的老少多買一點藥物及衣食用品。不久人們都以聖雲先來稱呼他。

華理柱主教本人實在可以隨時離開中國，似乎共產黨人也希望他這樣做。不過，華理柱主教卻積極鼓吹傳教士應緊守崗位，即使是被捕下獄而致死也在所不惜。他按照「善牧與羊群同在」這思想，在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合刊的「中國傳教士學報」發表論文說：

我認為這是一切天主教傳教士，包括神父、修士、修女，的基本責任，緊守崗位直至最後一刻。假如監禁甚或死亡將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應視這為生命中

所隨時會遇上的危險，是滿全我們責任的必要條件，也是履行任務所需付的輕微代價。21



在瑪利諾會的總會積極關注他的安全，並建議他申請出境許可時，已年屆六十高齡的華理柱主教覆信稱，除非會方命令他離開，否則他不會放棄為中國人民獻身。他帶點怒氣表示：「像我這樣一把年紀，忍受一點生活上的拘束，算不上甚麼。況且，為了我的宗教而被人推來推去，我也覺得有點兒厭倦了。」22

一九五八年十月他被捕以後，一直捱受了整整一年半日夜無間的疲勞審訊。共產黨人想令到他承認自己是間諜。儘管他未有受到身體上的折磨，但由於精神上的壓迫及居所的惡劣環境，使華理柱主教日後稱這段時間是獄中最艱苦的時期。23 一九六零年被判二十年徒刑時，似乎他已再沒有希望活著離開中國。他知道他期待已久為主致命的

機會，將在這漫長而單調的獄中生活以後徐徐而來。

一九七零年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特赦，促使華理柱主教前赴香港。在他重獲自由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這位早已準備為中國人獻出自己一生的主教，並沒有向監禁他的人說半句惡言。他早已原諒了他們，在他心中遺留下來的，全都是愛。

我並不怨懲那些試圖譴責我的人。我永不會對任何中國人發怒，早在一九一八年首次踏足中國時，我便有了這樣的念頭，而這些年來，即使身繫牢獄，這信念仍舊日趨堅強。我深愛著中國人。24

祈禱的力量

獲釋後，華理柱主教返回美國在瑪利諾會總院定居，但他的起居方式並沒有多大改變。這位被基督教界的報章譽為「活生生的致命者」的主教，盡量迴避新聞界的注意，渡著簡樸的、與在獄中時所差無幾的生活：以祈禱為一切活動的中心。

華理柱主教在居於瑪利諾會總院的最後十一年間，曾致信給一位本篤會朋友，向他說明祈禱在自己的牢獄生活中佔何等樣重要的角色：

玫瑰經是這十二年牢獄生涯的一大支持。我沒有任何宗教書籍，想要也不可能得到，所以完全沒法舉行感恩祭或誦唸日課。玫瑰經是我維持聖職的方法。與其整天記掛著熟悉的受難者，不如好好地為他們祈禱。玫瑰經的十五端奧秘，幫助我清晰而完整地回顧宗教的最核心

的真理，以及上主與祂的宇宙交往過程中的最重大事件。誦唸玫瑰經時，不期然就會產生思念、感恩、慰藉及希望。可以說，這是我整個囚獄期間不可或缺的生活指引。²⁵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零年間，全憑祈禱，令華理柱主教免陷於沮喪及精神錯亂。他也藉著祈禱，與外間世界溝通，並取得友人的支持。一九七三年，他向一群修女吐露說：

我知道在我入獄期間，你們一直為我祈禱。我深深感覺到你們及其他朋友的祈禱，以及我自己的祈禱，成了我的助力。祈禱是那麼有力，我本人就是祈禱產生效用的見證。²⁶

結語

華理柱主教成為成功的傳教士，其中一個重要的形象是他「不再是美國人，卻逐步成為中國人。」²⁷ 對於這一理想，華理柱主教一直義無反顧。為了使中國成為他生命及生活的中心，並為專心協助那些需要他的人，他作了循序漸進的轉變，以助他不斷接近目標。瑪利諾會現時深入委身為貧窮人及受迫害者服務，並非是近代的事，這其實是華理柱主教及其他赴華的前驅所遺留下來的經驗。

華理柱主教的獄中歲月，是一次長時期的考驗，以淨化他對中國人的認同及獻身。他的著述，包括適應的重要性、祈禱的力量及受苦在傳教士生命中的地位等，都在他自己身上體現出來，且不斷成為瑪利諾會的典

範。

一九七一年，華理柱主教自豪地向一批行將遠赴外地的瑪利諾會會士說，他的五十六年傳教士經驗可謂不枉此生，也鼓勵他們要滿懷信心、充滿喜悅地繼續走這條道路。

為主而全力以赴，誓不回頭。不要為少許困難而氣餒，也不要為大的考驗所難倒。有很多困難有待你們去解決，有很多苦頭有待克服，但這是我們聖召的一部份。要付出努力才有進步，有時更要嘗點苦楚。「麥子不死，依然只是一顆麥子；麥子死了，才結出累累的果實。」緊記它。遇到困難時，記緊必須堅持下去。²⁸

這是很具體的勉語，發自個人的實際經驗，也可以說是華理柱主教一生靈修行實的縮影。

華理柱主教以九十高齡安息於主懷時，全球各地都發表對他的悼念。人們稱他為「溫良而堅毅的傳教士」、「瑪利諾會的傳教先驅」、「為主耶穌基督而受苦的僕人」。更重要的是，他被譽為「永恆的傳教士」及「現代聖人」。²⁹ 這些讚語並非客套說話，而是藉一些事實以表達現代史上一位傳教士的過往一生。這些讚語實在是肯定華理柱主教是一位真正的「神修上的父親」，猶如中國人對司鐸所用的最貼切的稱謂——神父。值得我們不斷追念的，不但是華理柱主教不平凡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他的傳教士靈修觀，非常傳統，卻又同時非常的現代化。

(附註見頁 67。)